

“药神”王振义：百岁院士一生为患者

他被誉为“中国药神”，攻克了最凶险的一种白血病，并且放弃申请专利，只为让更多病人“吃得起药”；他言传身教培养出一片“人才森林”，造就“一门四院士”的传奇……他，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王振义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，王振义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

起点也是最重要的闪光点

王振义祖籍江苏兴化，1924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。因笃信教育救国，振兴中华，王振义的父亲在给家中5子起名时，分别冠以“仁义礼智信”，王振义是家中次子。“小时候，在鸭蛋形的餐桌旁，我爸爸每周都要考校8个孩子的功课，好的表扬，不好就要惩戒——我是唯一没有被罚过的！”

1942年，从小立志学医的王振义以优异的成绩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向明中学）毕业，免试直升震旦大学医学院。1948年，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配到广慈医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）。

“我当时是住院总医师，所以选科时就让其他人先选，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血液科，大概是觉得血液病人不多。”王振义当时认为，血液病应该不难，只要一台显微镜就能解决诊断问题，“所以觉得自己很能胜任，真没想到血液病这么复杂，这么难治。”这个起点，也成就了王振义医学人生最重要的闪光点。

当时还是青年医生的他，足迹遍

布皖南、嘉定各地，可以说是“哪里需要就跑去哪里”。王振义曾这样深情表白：“我最盼望国家富强，百姓安稳，我能做一个好医生。”

“只想病人能好”

1959年，王振义第一次以医生的身份“遭遇”白血病。当时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(APL)是病情恶化最快、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白血病，如不及时治疗，90%的病人将在半年内死亡。为攻克白血病，王振义除了问诊、查房，就是泡在图书馆、档案室翻阅资料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国际上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法是化疗，但患者化疗后的5年存活率只有10%至15%。王振义在50年代学过中医，有中西医结合的理念。“肿瘤细胞除了被杀死，能不能劝它们‘改邪归正’？”王振义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用诱导分化的方法让坏细胞变好！经过8年探索，他带领团队尝试了无数种方法，最终发现国产的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将APL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胞。

1986年，一名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女孩在上海儿童医院奄奄一息。王振义的夫人谢竞雄时为儿童医院的顾问，就把情况告诉了王振义。王振义仔细研究了女孩的病情，最终决定让她服用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。有人劝他：“用新药来治疗，一旦有啥问题可就名誉扫地了。”但王振义说：“我相信科学，我有信心。”

奇迹出现了，女孩只吃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全反式维甲酸，病情就出现

转机。如今，4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女孩依然健康地生活着。这次治疗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理论让癌细胞“改邪归正”的第一个成功案例，也因此，王振义被誉为“癌症诱导分化之父”。

1988年，王振义将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《血液》上，这篇论文成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此后，王振义和学生陈竺、陈赛娟等又一起创造性地提出“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”治疗方案，最终使这个曾经最凶险的白血病5年生存率从10%提高到95%以上，成为第一种可被治愈的白血病。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称为“上海方案”，更列入“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”之一。

令人敬佩的是，王振义在找到攻克APL的“特效药”后，并没有为全反式维甲酸申请专利，而是无偿地将这种药和治疗方案向全世界推广。“钱或者名誉的问题，我不会去想，我只想病人能好。”他说。

最动人的言传身教

大医精诚，不仅对患者，也对学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为了更好地探究血液学和血液病的奥秘，王振义联合瑞金、仁济、新华、九院的血液科和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，组建上海血液学研究所，并出任首任所长。如今，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已成为全世界血液学界的“重镇”，承担100多项国家级课题。以上海血液学研究所为基地，王振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。

陈竺、陈赛娟夫妇是王振义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。陈赛娟回忆，“那时，王振义院士不但手把手指导我们做实验，还每天晚上帮我们补习外语。”1984年，王振义力荐陈竺夫妇赴法国留学。1989年，陈竺夫妇

回到祖国，成为王振义院士的左膀右臂，分别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两方面开展研究工作，并最终开辟出一片全球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。

海南医科大学校长、上海交大医学院原院长陈国强院士也是王振义的得意门生。他常说，“那时还没有电脑，写了论文，王老师一遍遍修改，前前后后改了十次。我就重新整理、抄写了十篇。”王振义的科学精神，始终鞭策着陈国强向更高远的目标前进。

1995年，王振义主动让贤，举荐学生陈竺担任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。2003年，在让贤所有行政工作后，王振义主动要求学生们对自己进行“开卷考试”，把临床上碰到的疑难病历发给他，他开始针对这些难题搜索全球文献，每周四做成PPT到医院与大家共同探讨。对疾病的执著探究，不仅使患者摆脱疾病困扰，也让更多的年轻医生学会医学诊断的思路，这是王振义对学生们最大的支持。

王振义的医者大爱也不仅局限于病人。多年来，他善行的步履从不停歇，托学生捐款给汶川大地震伤员，每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定期捐款，取出积蓄设立青年医师奖励基金……2020年，王振义将未来科学大奖“生命科学奖”的百万元奖金全数捐赠给瑞金医院“广聚善爱”（慈善）基金项目，至今已有65位受助者的病情得到缓解或治愈。

一花不足春，接力春常在。从医执教75年间，王振义共带教33名硕士、22名博士。当年那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实验室，走出了陈竺、陈赛娟、陈国强三名院士，留下了“一门四院士”的佳话。

面对人们的赞许，桃李满天下的王振义说：“不是我培养了他们，是时代、国家给了他们机会，也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就了他们自己。我很幸运，能与他们共同攀登。”据《老年文汇报》

戴笠刻意“栽培”沈醉

沈醉当年是国民党军统高官，在军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戴笠与毛人凤等少数几人。他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。1932年，18岁的沈醉在长沙艺文中学读书，后来又因故辍学，只身来到上海，经亲戚介绍进入戴笠的复兴社当联络员。虽然沈醉后来在回忆中称自己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，但当时的沈醉还是热情十足，加上他聪明能干、思想单纯，与戴笠一见面，马上博得这个复兴社总头目的好感。

戴笠初次见沈醉，与沈醉“谈了足足有一个小时”，临走时，戴笠还拿出100元钱，让沈醉“在杭州玩玩”，并说：“我儿子跟你同岁，在上海上大学，放寒假你同他一道去南京玩。”沈醉在回忆录中说：“多年来，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。现在我才懂得，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，他急需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，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都各自有自己的一套打算，思想很复杂，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，而我则是初出茅庐，年轻、单纯、可塑性大，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。”事实也是如此，一方面凭借戴笠的栽培，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出色“成绩”，沈醉不仅成为戴笠的心腹，而且一路官运亨通。

戴笠对沈醉甚至有些“偏爱”。有一次，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借了沈醉300元的公款，快到发饷的时候还没有还。沈醉拿不出钱给手下的特务发饷，就大胆去找戴笠。戴笠除还了钱外，还当沈醉的面“用鸡毛掸子把戴藏宜打了一顿，骂他没有出息，要他向我学习”，这让沈醉觉得很得意。

当上特务后，年轻的沈醉“手脚勤快，头脑灵光”，加上“又肯钻研”，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，而且做事精明利落。从“巧计送捕徐昭俊”一事就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。一次，戴笠发出命令：逮捕疑有不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密送南京。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，此人身高力大，腿脚敏捷，武功很好，枪法也准，要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别的特务都不愿接这个任务，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了下来，还放假消息说自己犯了大错，戴笠要逮捕他，要徐昭俊把他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。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，一下火车，自己却被绑了起来。

凭借着这些“优异”表现，沈醉博得了戴笠的“大加赞赏”，很快就升职为情报组组长。

据《各界》西域 易铭/文

